

納 伊 ( Joseph S. Nye, Jr. )

1995年12月中旬，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納伊辭去美國國防部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職務，就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納伊在華盛頓任職期間，力主美國同中國對話以及建立廣泛的政治、軍事及戰略關係；鼓勵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主張兩岸和談解決統一問題。他亦是克林頓政府在東亞及太平洋安全戰略決策方面的主要決策者及推動者，曾數度訪問中國。

1996年初，本刊委託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徐國琦先生代表本雜誌採訪納伊博士，在此謹表謝意。以下為本刊編輯室提出的問題（ ）和納伊的回答（ ）。

在美國政府內，就如何同中國打交道一直有爭論，爭論的側重點是接觸還是圍堵問題，美國對華政策究竟是甚麼？

克林頓政府毫無疑問奉行同中國廣泛接觸的政策，否則，我們目前的對華政策就會完全兩樣。中美兩國關係的確存在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和差異只能通過雙方的政治、軍事接觸與對話才能解決，並明白彼此真正在想甚麼。我們認為，全面接觸和對話是避免兩國關係惡化、並保證其健康發展的最佳政策。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所以未奉行圍堵中國政策，是因為她無法取得其歐亞盟國的支持，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單方面圍堵中國，其結果只能以失敗告終。因此，美國非不為，而是不能為。對此，您有何評論？

這僅僅是一種推測而已。因為圍堵中國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所以美國不會實施這個政策。實際上，唯一能促使圍堵政策出台的不是美國或其他因素，而是中國自己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如果中國採取務實、理性的內外政策，致力於改革民主化進程，對外奉行負責、合作的政策，沒有國家會對中國進行圍堵，也圍堵不了。

也許中國方面會質疑，如果美國真的不想圍堵中國，那又何以解釋其反對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以及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事實？

美國反對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主要是由於六四事件，跟圍堵中國無關。而且，這一事件只是兩國關係中一個小插曲而已，不應影響中美關係大戰略的宏旨。至於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經濟而不是外交因素在起作用。美國不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希望她在承諾履行會員義務及條件後方可加入。

您是否認為美國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過苛，超過中國所能接受的限度，從而可能迫使中國在長達 年的追求中失望而退？

我不這樣認為，中國最終會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我想中國、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一定會替中國找到解決加入該組織問題的方法。

1995年以來，有關所謂「中國威脅論」及圍堵中國的論調在美國、英國等媒體中甚囂塵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1995年10月31日的社論中稱此反華現象為西方的「中國綜合症」。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西方媒體過於誇大中國的威脅。從歷史上看，一個大國的興起總是會引起有關國家輿論的過份反應，這是很正常的現象；而且美國是民主國家，新聞學術自由，允許發表各種不同的聲音、觀點。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決策層內部尚有異見，不同的部門有時採取的對華方針亦不一樣，更遑論媒體了。但視中國為敵人是錯誤的。中國現在不是敵人，也沒有理由認為她將來是敵人。中國並不是一個擴張的國家，她目前的主要集中點是發展經濟和改革開放。儘管中國的軍事力量會隨著國力的提高而進一步壯大，但我不認為她會在短時間內成為美國的威脅。如果西方把中國看成敵人，無疑會得到敵人。這是極其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國將來是敵或友的機率頂多各佔一半，但「中國威脅論」及圍堵中國的論調無疑會加速其向敵方傾斜。如何正確對待像中國這樣一個正在興起的國家，對西方而言是一個巨大挑戰，其最大的危險是戰略判斷失誤。錯誤的估計中國會對西方構成威脅，並據此實行圍堵，是愚蠢的舉動。我認為，最好的策略是同中國廣泛接觸及交往，從而消除彼此的隔閡。

前不久您在亞洲學會發表的演說中聲稱，台海危機可能危及美國安全利益，美國屆時是否軍事捲入，無人知曉。您並以朝鮮戰爭為例說明台海危機的嚴重性。無獨有偶，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最近也公開撰文指出，台海危機對美國造成的危險比波希尼亞尤甚。現在的問題是，中美曾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難道台灣對美國如此重要，以至非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軍事衝突不可？

美國處理台灣問題是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準則的，亦即美國希望台海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反對中國使用武力。我之所以援舉朝鮮戰爭為例，旨在表明各方不要誤判對方。當年美國忽視中國的多次信號，未能意識到中國政府一再警告勿將戰火燒到中朝邊境的嚴重性，結果誤判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性。朝鮮戰爭提供給我們的另一個可借鑒之處是，美國可隨時改變戰略、介入戰爭。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曾一度公開將台灣和朝鮮劃到美國保衛圈之外，但當朝鮮戰火燃起，美國便立即出兵朝鮮半島，第七艦隊亦迅速開赴台灣海峽，承擔起保衛台灣的責任。目前美國不願說明是否會軍事捲入台海危機，一是未能確實預知未來的政策，二是這種「不知道」的態度也是美國的策略。這個戰略的運用，可以取到威懾台海兩岸不要輕舉妄動、鋌而走險的作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懾作用在於：美國的「不知道」策略可迫使中國擬憑藉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三思而後行，因為美國有可能軍事干涉；另一方面，對台灣的威懾作用在於：美國希望台灣積極同中共對話，並以務實的態度同中共談判解決統一問題，不要一味同中共政權分道揚鑣、破壞現狀，結果刺激中國用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如果台灣以為美國在中國對台用武時會出兵保護，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美國目前的「不知道」策略可能意味著，當兩岸一旦動武，美國也許只會袖手旁觀。

請問甚麼是中美關係中可能導致衝突的重要因素？

主要有四大衝突因素：台灣問題、貿易糾紛、人權及核武器擴散問題。台灣問題的重要性主要在於，根據台灣關係法與美國安全戰略，台海之不穩定可視為對美國安全的威脅。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問題也很多，例如保護知識產權、關稅問題等就是其中容易引

起衝突的方面。對人權的尊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重要體現，中國的人權記錄是一個很容易引起美國人民普遍關注的問題。對美國來說，核武科技繁衍擴散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戰略問題。如果中國對此不能妥善處理，很容易導致雙方關係的惡化。對上述四個方面，中美立場有嚴重分歧，雙方處理稍有不當，極可能引起衝突。

有一種觀點認為，決定中美未來衝突的因素不是政治、軍事及經濟因素，而是文明的差異。您的同事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轟動一時的文明衝突論，即為此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他認為未來世界的主要衝突源將是儒教（以中國為代表）及伊斯蘭文明聯手同西方文明（以美國為代表）的對抗。對此一觀點，您有何評論？

文明衝突論是一個極其錯誤的理論。縱觀歷史和當今的各種國際衝突，大都發生在同一個文明內而不是相異的文明之間，我認為未來也將如此。

您認為未來的中美關係是可以駕馭還是容易失控，抑或會產生新的冷戰？

我認為是可以駕馭的。只要雙方經常積極的交往對話，中美關係就很難偏入斜道而不可自拔。我認為這種建設性交往是會一直進行下去的，因為維持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是兩國長程的共同目標。因此，雙方有廣泛的合作對話的空間及動機。從長遠看，我對中美關係的前途充滿樂觀。

您在《註定領導》（Bound to Lead）一書中，曾以「硬力」（hard power）和「軟力」（soft power）兩概念來分析美國的國家實力。能不能請您用同樣的概念來分析中國國力中的「硬力」及「軟力」？

中國的文化凝聚力及優良傳統，無疑是其「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要著重指出的是，有些人強調在中國貫徹西方的人權觀念，便會削弱這種「軟力」，因為這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認為此看法是錯誤的。人權是適用於全世界的，它對中國國力的「軟力」有互補作用。所以，改善中國人權會提高而不是削弱中國的「軟力」。至於「硬力」方面，中國今天的地位顯然跟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中國的經濟以目前的幅度繼續增長下去，其「硬力」很快便會攀升至世界前列，並在不久的將來同美國並駕齊驅。西方應作好接受一個強大中國的心理準備。

您對未來的中美兩國領導人在如何正確處理中美關係方面有何忠告？

永遠著眼於長遠目標（always think in long term），認準兩國只有在合作及友好的關係下才能維持雙方基本利益，不要為出於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需要或失算的短期衝突、磨擦而影響中美關係的長遠目標。雙方應不斷保持戰略對話。

您是國際關係專家，您覺得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大致如何？

預測未來在學術上和政治上是危險的行為，因為影響未來國際關係的變數太多，加上本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國際關係的巨變也是對未來學家的警鐘。無人料到：蘇聯竟會在頃刻間瓦解，德國迅速統一，西方如此快地取得冷戰的勝利，中東和平在短時間內出現如此巨大變化，等等。也許，未來可能有更多不可想像的事情發生。儘管有這些前提，我覺得可以有把握預測的是，美國在下一世紀應該還是國際關係中的主導國家，仍執國際關係的牛耳；中國的地位應該進一步上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強國；而歐洲及日本則仍舊會在國際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

納伊 (Joseph S. Nye, Jr.) 1937年1月19日生於美國新澤西州，1964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旋即留任哈佛任教，並成為講座教授。他是美國諸多著名機構如「三邊委員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外交關係委員會等機構的活躍成員，並獲選為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歷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及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主任之職。

納伊是美國傑出的國際關係專家。主要著作有：*Pan Africanism and East African Integration* (1965);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1971); *Nuclear Ethics* (1986);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1990);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1993)。

納伊也是在學術機構和政府部門輪流任職的兩棲學人。1977-1979年他曾任職卡特政府，負責安全援助事務的副次國務卿。克林頓入主白宮後，納伊又先後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及國防部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1995年12月18日在複雜情感中辭去他很喜歡的政府職務，就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他自述其作出這一人生重大決定的原因是，他在華盛頓期間，愈來愈深刻地意識到美國政府與美國公民之間的關係已經脫節，雙方的信任紐帶不復存在，這一局面將會嚴重影響美國的前途與國家命運。重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任是他作為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的重要使命。

---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1996年4月號總第三 四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